

# 融入还是隔离？

Ulli Diemer

我总是很喜欢读《空间》(spacing)，一本关于多伦多城市地貌的杂志。它里面的文章都很多元而且一般都写得很好，插图得当，思想先进；而且总体的观念是方便自行车、方便行人、反对公共土地的私人主宰。

价值观都是我赞同的，但是我最近却发现春季发行的“环境制造者”特写一栏，大标题是“创造归属感”，它描述了一位其提倡者和社区组织者，刚刚被一个多伦多组织授予社会公正荣奖。我不想指出这个人，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努力去做她认为可以把社区变得更好的事情。无论如何，他的观念也是大多数人的观念。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这种观念竟然被这么多人这么毫无怨言地接受着。

那篇文章的主题是：我们需要让加拿大多种多样的“社团”有归属感，而且“社会融入不是把泰坦尼克号的椅子重新编排，而是造一座新船。”

为了更好地解释她的观点，她谈到了在一个社区会议上，一个旁遮普人对她说他和他的朋友去夏天的晚上在公园玩的时间被限制了，因为在这公园附近唯一的公共洗手间——在附近一个图书馆里——下午5点就关门了。她建议他们把这个告诉也在这个会议里的地方委员会的人。由于她做翻译，他们把这个问题顺利地反映给了政治官员，政治官员承诺说她一定会去看怎样可以改善。

那个组织者说，这时刻对于那个旁遮普人来说就是感受到自己权利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刻告诉他，即使不会说英文，他所说的、所做的，仍然很有价值。她还得出了一个更广义结论：这次交流暴露出了多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在于人们不参与，而在于参与的地点。她说一般移民者讨论政治的地方是他们的社区中心，清真寺，公园，和自己家。那位组织者说：“那个政治官员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但是如果她不能够理解她的民众，这又有什么用呢？”那位组织者说：“我给她的建议是，不是去创造一个框架然后期待民众去参与，而是你应该做那种艰难的工作，去发现各个社区，倾听他们的想法，不论他们是用哪种语言说的。这是很困难，但这就是多元文化的复杂性。”她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建造一个“使我，我的孩子，其他的移民者，以及所有被边缘化的人都有归属感”的社会。

没有人对这位倡导者描述的“美好时刻”有任何负面评价。毕竟，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过那种“寻找厕所是第一要务”的时刻，而且我们都认为有更多的公共厕所总是好的。

但是难道这就是“权利”所在？告诉一个政治官员厕所被锁了，然后得到一个承诺说去看看怎么解决？而且这位社区的提倡者，以及那么多像她一样的人，他们到底在寻找一种什么样的“多元文化”？

多伦多300万居民说着超过100种语言：这座城市的官方网站用140种语言提供信息，我们真的相信让多伦多被选举上的一小群政府官员整天绕着寺庙、教堂、社区中心、公园、甚至私人住宅去倾听人们用自己的语言说出的话可能吗？

这想法太荒谬了，我甚至怀疑这些拥护它的人真的相信它。在他们脑海中真实存在的情形，我怀疑，就像上面的那个故事：一个英文非常流利的社区领导者，被选上，或者自选，成为一个发言人，然后告诉政治官员们那些他自己认为的他们社区的人的想法和需求。所以这权利事实上存在于一群社会活动家，他们要不作为“他们”社区的官方代表，要么去有资金的社团机构工作。

我不想贬损很多这些机构提供的有价值的服务，我也不想质疑为其工作的人的付出和敬业。但是我确实要问问这个“权利”的架构。如果他们不掌握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所使用的语言他们怎么有权利可言？就像在加拿大，所有和权利有关的，任何形式，都是英语——政府使用的，工作使用的，媒体使用的，以及高等教育使用的，都是英语。一个人怎么可以说有权利和归属如果同时又拥护一种认为市民不愿意也不需要掌握官方语言的社会模型？这个模型是支持分裂，排斥和无权的。

要讲清楚的是，我觉得为不会说英语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提供基本服务是好的，也是值得提倡的。我很高兴我们城市的官网用 140 种语言提供信息。我很开心我们有翻译者去帮助那些在健康或者法律方面需要帮助的人。我享受着生活在一个居民来自世界各地的城市。但是我也相信那些支持社团相互独立——说不同的语言，和别的社团隔开，并且仅仅通过翻译来进行社会交流——的观点的领导者其实在带来更多的伤害。他们支持的不是多元，而是对立。

他们也许初衷是好的，但是他们事实上正在剥夺人们的权利——鼓励人们仅仅通过他们种族或宗教中的其他人来与社会联系。而且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提倡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属于这个模型：他们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不需要等政治官员来找他们然后倾听他们要讲什么，他们直接去可以制定行动的地方，非常强烈地索取他们需要的。

其实，这种让社会由很多根据种族、语言、宗教形成的社区组成的概念是真正“权利”的完全对立。这是一个认为“做出改变”仅仅就是为自己的社区游说到更多服务的模型。你想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狭隘、保守，甚至有损于自己的想法。

真正的改变，真正的权利赋予，只有在人们追求共同目标而忽略种族的时候才会发生。比如，有一样东西使很多新的移民和加拿大出生的公民联合在了一起——共同的低工资和恶劣生存环境的经历。工人运动，这种有组织的对改善劳工生存状态的需求的表达，成功地把工人，不论他们的背景，联系在了一起。雇主们，从另一方面来讲，一直都想通过种族、语言、或者宗教信仰使工人么对立。到底一个工人和谁有更多的共同点呢？一个善于利用但是和自己一个种族的上司，还是背景完全不同但是面临同样困境的同行呢？

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哈勃政府一直忙于破坏阻止温室效应的行动，推动政府服务的私人化，签署同意所有的推进公司全球化的措施，而且对布什管理的全球事务提供毫无条件的支持。

当这些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希望看到种族团体对这等事件没有任何兴趣、不想开展对此类事件的斗争呢？这些问题难道可以被那种政客到社团中倾听然后考虑他们能做什么的模型解决吗？

而且，事实上，什么时候当权者——那些公司执行长官和政府官员——真正倾听了有悖

于他们利益或者意识形态的话了？什么时候当权者真正向某些事情妥协了？当然，群众运动，那种以直接且强大的方式挑战他们的反对力量除外。

作为一个移民，并且第一语言不是英语，我坦诚地说，当有人说移民仅仅关心他们自己的“小圈子”时，我总是觉得很受侮辱。而且，作为一个无神论者和非宗教主义者，每当听到别人建议在一个非宗教主义的社会，像加拿大，政治行动在教堂和寺庙周围可能会比较好时，我也会有点不舒服。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相信劳动可以摆脱资本主义——我不觉得权利的授予体现在一个政治官员承诺会去看看她可以为洗手间多开一个小时做什么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以把人联系在一起去做真正改变的观念，而不是那种是人们保持隔离的想法。这就是我的关于“停止重新排椅子，建在一所新船”的想法。

2008年8月10日

(翻译：杨韞)